

拉贝日记·北京卷

John Rabe, Peking

我眼中的北京

原著 [德] John H. D. Rabe 约翰·拉贝

主编 梁怡 顾问 刘建业 翻译 邵京辉等

東方出版社



拉贝日记·北京卷

我眼中的北京

原著 [德] John H. D. Rabe 约翰·拉贝
主编 梁怡 顾问 刘建业 翻译 邵京辉等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亚男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眼中的北京/[德]约翰·拉贝(Rabe, J.) 著;邵京辉 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60-3491-3

I. 我… II. ①拉…②邵… III. 社会生活-史料-北京市-20 世纪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4176 号

One part of the price of this book is a donation for humanitarian activities of the “John Rabe
Communication Center” in Heidelberg and the internet link (www.john-rabe.d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omas Rabe

本书由托马斯·拉贝先生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

我眼中的北京

WO YAN ZHONG DE BEIJING

[德]约翰·拉贝 著 邵京辉 等译

主编 梁 怡 顾问 刘建业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插图:8 页
字数:15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5060-3491-3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约翰·拉贝——我眼中的北京

我的祖父约翰·拉贝于1882年11月23日生于汉堡市。1908到1938年间，他作为商人生活在中国。作为西门子的工作人员，1908到1925年间他首先生活在北京，1925到1932年在天津，1932到1938年在南京。

约翰·拉贝在华期间写了20多本书，但1997年在他过世之后这些著作才通过《南京日记》得以被世人所认识。书中他对1937年开始的南京战争做了记录。1997年这些书被他的好友，曾担任过德国驻中国大使的埃尔温·维克特（Erwin Wickert）博士出版，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约翰·拉贝于1932到1938年间居住在南京小粉桥街一号。2006年9月30日，作为约翰·拉贝的孙子，我和我的妻子伊丽莎白·拉贝将他的旧居作为博物馆、纪念馆和和平机构“约翰·拉贝和国际和平区域纪念馆”及“约翰·拉贝国际和平和调解研究交流中心”向公众开放。南京大学的副校长张荣在开幕式上讲道：“拉贝先生的故居不仅是纪念他的一个平台，也是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和平机构。”一部国际电影《拉贝日记》（导演佛洛里安·加仑贝格，乌尔里奇·图库尔饰演拉贝，史蒂夫·布西密饰演威尔森博士，丹尼尔·布鲁赫饰演罗森博士）将再次把这段历史重现于世人眼前（制片人霍夫曼、赫尔曼和莫伊托）。该片已经于2009年2月7日在柏林电影节上举行了全球首演，也将于今年5月在中国上映。

1908年约翰·拉贝就跨越西伯利亚地区，乘坐火车来到了中国。他先是在北京一家讲德语的公司任职，1911年进入西门子驻北京公司。1919年所有的德国人被英国人遣返回国，1920年拉贝再次从日本中转来到中国，建立了西门子在北京的分公司。直到1925年他才被派往天津。

拉贝在他的四卷书《我眼中的北京》和《慈禧的最后诏书》里描写了1908到1930年间他在北京的生活。这些书幸亏借助北京联合大学的梁怡女士

的帮助才得以出版。梁怡教授是一位历史学家，她曾于 2003 年 11 月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访问了海德堡大学的汉学研究所。那时，她曾是我家房客，住在海德堡的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其间，我们向她展示了拉贝的 20 余本书，她带着极大的兴致研究了这些书。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她当时看着那些北京城的旧照片，指着其中很讲究的老北京四合院图片说，她的外祖母就住在那种结构的院子里。梁怡女士的外祖父母曾经生活在由爱新觉罗和莽古岱两族姓组成的满蒙联姻的大家庭。因此，她对描写近百年前的老北京的五本书尤为感兴趣。其中四本名为《我眼中的北京》的书，描写了北京当年的城市景象、文化生活、手工艺，有大量精美的图片、照片和绘画。

2006 年 5 月，梁怡女士再次来访拉贝交流中心，又仔细看了《慈禧的最后诏书》里描述了慈禧驾崩前宫廷内的情况。这次访问，使她得出了这样的看法：这五册书，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完整记录了北京这座中国的文化名城留给他的最深刻的印象。于是，我们进一步和梁怡女士商议了出版《我眼中的北京》这样一本书的想法。应该说，这几年中她一直为这五卷书的出版而不间断地奔波着。

2008 年梁怡女士找到了合适的翻译后再次审阅了这五本书，并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编纂成一册《我眼中的北京》。没有她的努力，没有她对这个课题的兴趣、执著的热情和高水平的办事能力，这本书很可能不能在中国出版。

在此我们全家对梁怡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同时也对东方出版社表示感谢。

作为拉贝的后人，我们感到万分自豪，自己的祖父收集了有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资料并保留下来。对于对 20 世纪初北京的文化和生活感兴趣的人来说，梁怡教授出版的这本书是个很重要的研究资料来源。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唤起更多的人对北京历史的关注，并预祝此书取得成功。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进一步巩固业已存在久远的德中两国之间的友谊。

托马斯·拉贝

（约翰·拉贝之长孙）

2009 年 3 月 3 日 于 海德堡

我的房东与《我眼中的北京》（代序）

一、巧遇拉贝后人

在德国景色瑰丽、妩媚迷人的巴登-符腾堡州，有一座美丽而又浪漫的古城——海德堡。它依山傍水，山脚下那常年清澈见底、流淌不息的内卡河，见证着海德堡悠久的历史。海德堡吸引每年几百万世界各地旅游者到这里来的魅力，就是那 60 万年前古人类的祖先——海德堡人的遗迹；中世纪占据高山之上的维特巴赫家族选帝侯威严城堡的遗骸和以海德堡大学为代表的海德堡文化。诞生于 1386 年的德国第一所大学——海德堡大学，曾经是黑格尔、本森、雅斯贝尔斯、迦达摩尔等众多大师工作和学习过的地方。到海德堡之前，朋友们告诉我，你将住在画里，当时，我想象不到它的美丽。我到海德堡时已经是 11 月初了，可海德堡的景色依然如同一位丽人，正在悄悄褪去漫山遍野的绿色，换上赤橙黄绿、层林浸染的新衣。无论驾车在路边铺满绿色地毯般的大道，还是在金黄色与红色相间满山的丛林；不论你是专程郊游，还是每天正常的上下班，绚丽的景色随处可见。据说，由于人杰地灵，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德堡没有像大多数德国城市那样遭到战火的破坏。一批美国托管军到这里来以后，被海德堡美丽的景色吸引，从此世代居住于此。

托马斯·拉贝教授曾是我的房东，我住在他家纯属偶然。2003 年 10 月至 12 月，我得到国家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和德国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资助，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德国进行三个月的学术交流，主要目的是为我承担的国家级课题《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搜集研究资料。按计划，我要主访杜伊斯堡大学、海德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三个汉学研究单位。三个月里要住在三个不同的城市，租房就成了我德国之旅的大难事。短期租房，难找合适的住处不说，房租也贵。我自己制定的选择住房的标准是：房东要对中国人友好；房租不要太高。海德堡大学是我在德国的第二站。经过几番网上联系，校方为

我推荐了几个候选房东里，我一下看中了拉贝家，一串问号立刻产生，是那个南京大屠杀见证人约翰·拉贝家吗？强烈的好奇心促使下，我迅速在网上搜索了“拉贝交流中心”的网站后，顿生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感觉。于是，节省房租已不在考虑之列了。我兴奋地当即给拉贝教授发了电子邮件，他也热情地给我回了电话。几天后，我坐火车从杜伊斯堡来到了海德堡。拉贝教授专门安排她的妻子艾莉（当时是女朋友，一位罗马尼亚医生）和管家到火车站接我。他们没有让我和其他的房客住在一起，而是专门腾出一间卧室给我。我住在他家的一个月里，他和他的妻子对我照顾有佳。

拉贝教授的性格不像是拘谨的德国人，而更像性情开放的美国人。每天晚上我们仨人一起，点燃蜡烛，共进晚餐，边吃边聊。拉贝的姨妈也住在这个城里，她自己没有孩子，拉贝教授就像是她的儿子一样照顾她。周末一般我们到他家固定的北京餐馆吃饭，或全家一起到山上欣赏海德堡秋天的景色。有时也请十几个朋友到家里来聚会。

一天聚会时，拉贝教授兴致很高。拿出他从中国置办来的各种仿清朝的服装，并请我帮助他的朋友们穿上，让大家看他带团去中国的录像。客人散尽后，他打开客厅的柜子，搬出了20本旧书让我看。这时我才知道，真正的《拉贝日记》共有20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拉贝日记》还收藏了他所收集到的从1908至1938年间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的照片和绘画，记录了部分旧中国的时政要闻。还有少量他的家庭照片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度假时的照片。我知道，我遇到了难得一见的史料。拉贝教授说这些都从未让别人看过。见我对这些日记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他当即表示，这20本日记我随时可以看。于是，每天晚饭后，除了写我的《旅德日记》外，看、猜（因为我不懂德文）这20本《拉贝日记》成了我每天晚上必做的“家庭作业”。

《拉贝日记》制作得相当讲究。16开大小，用粗麻布内包硬纸板作为封面。卷内的纸很厚。一般情况下，一面是文字（字是作者用打字机打的），一面是相片、图画和简单的说明。两页中间用透明薄纸隔开。拉贝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日记也是图文并茂的。扉页和插图大多是自己画的。关于南京的那几卷是浅

灰色的封皮，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拉贝画的战斗机。

通过这 20 本日记，我对拉贝本人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 1882-1950）1882 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父亲是一名船长，在他 16 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因此，初中还未毕业的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到社会上谋生。1908 年 8 月 2 日，年轻的拉贝从德国汉堡启程，乘火车穿越了俄罗斯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经过 16 天的漫长旅行，于 1908 年 8 月 18 日到达北京。

刚踏上中国土地时的拉贝，除了从书本上获得的有限的中国知识外，他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但这个古老的城市很快吸引了他。他的未婚妻道拉也随后到来，他们在北京结为伉俪。拉贝开始是在一家德国商店里做售货员，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栖息之所究竟在哪里。由于他在汉堡当过学徒，在非洲漂泊四年，有一定的阅历和经验，加之售货员的工作可以有机会结交许多朋友，于是在 1911 年，他走进了北京东城区苏子胡同，到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分公司应聘，最终他得到了一份会计兼文书的工作。他本人曾有这样的记载：“我并不是一个生手，但我知道什么叫——失业，我不羞耻于承认，当我在德国西门子北京分公司得到一个会计和文书的职位，可拿到微薄的工资，得到一间温暖的工作室，我和妻子激动得热泪盈眶”。^①此后，拉贝先后担任了北京和天津分公司的经理。1931 年 11 月，拉贝出任南京分公司经理。^②拉贝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近 30 年，他的儿子、医学博士奥托·拉贝、女儿格雷特·拉贝女士、外孙女莱茵哈特女士均在中国出生长大。他们一家与中国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拉贝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1937 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时任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的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他被推举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们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力保护中国难民。南京安全区为大约 25 万中国

① 参见黄慧英著：《拉贝传》，百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4 页。

② 同上。

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甚至拉贝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进了600多名中国难民，他因此享有“南京的辛德勒”的美誉。为了表彰拉贝为中国抗战所做的贡献，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授予他



领授采玉勋章

“领授采玉勋章”一枚，编号98。他在1937年（丁丑年）9月19日至1938年2月26日撰写了2460页的《敌机飞临南京》（*Feindliche Flieger über Nanking*）的“战时日记”，记录了他亲历的这段历史。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他连续举行报告会，并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罪恶。由于受到德国警察

盖世太保的讯问和警告，他只得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希望将这些历史的记录留给后人。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日记随拉贝家族几经搬迁。据托马斯·拉贝教授讲，“二战”期间拉贝家族几乎损失了95%的家产，一贫如洗。战争结束后，在他们一家一度处于濒临饿毙的绝境中，南京人没有忘记他，1948年来自南京政府和各界民众的各种募捐、食品包裹从天而降，使他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勇气。对中国魂牵梦萦的拉贝于1950年1月在柏林患中风去世。

1996年12月，被尘封了60年的《拉贝日记》，在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发现和促成下，由她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夫人奉献给世人。对于这些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重要证据，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的7位德文教师进行了整理翻译，于1997年出版了中译本，《拉贝日记》（南京卷）终于为世人知晓。^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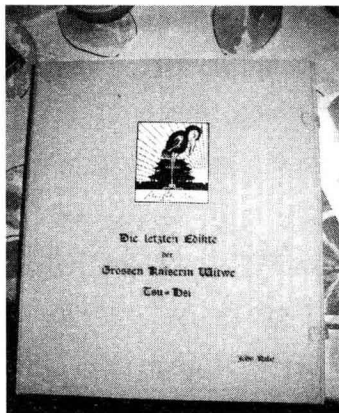
老拉贝的长孙、妇产科大夫——托马斯·拉贝教授为了纪念他祖父巨大的人道主义贡献，在海德堡的家中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纪念馆——“拉贝交流中心”以示怀念他的祖父和与中国的友谊。

二、《我眼中的北京》五卷

然而，对我来说最惊奇的不是我住在了这位名人之后的家里，而是我在他

^① 《张纯如一个不为人知的贡献——发现了《拉贝日记》》：News.sohu.com，2004年11月18日11:24《金陵晚报》。

家里发现了现在得以面世的《我眼中的北京》五卷本日记。这五卷日记都是用黄色布面做的封皮。其中四卷的封皮用德文写着《我眼中的北京》(Peking, Wie Ich es Sah), (Band 1, Band 2, Band 3, Band 4)。另一卷书名为《慈禧的最后诏书》。书名的上方画着一只乌鸦,乌鸦下面有老拉贝的签名——Rabe, 即拉贝。拉贝是族姓, 德文的意思是乌鸦, 在德国乌鸦被视为一种情操高尚的神鸟。因此, 拉贝



一家特别喜欢乌鸦, 从大门口的标志到家里的陈设都刻有各种各样的乌鸦图案。

约翰·拉贝不懂中文, 但石头庭院宁静的生活却使他感到丰富和满足。生意之余, 逛博物馆、坛庙、宫殿、市场, 遍访名胜古迹, 领略中国文化的



精髓, 是他的一大爱好。他有一枚中文印章, 刻着他当时的中文名字——艾拉培。还有一枚木制的大图章, 上面刻着“阿拉備”。在中国生活工作的30年, 其中有20多年是在北京度过的。因此他对中国的记录, 以北京最为详细。德国人埃尔温·维克特形容“他属于那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中国通, 说一口纯正的英语, 但不会说中国话, 和中国人交谈却用洋泾浜英语, 他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 理解中国人, 而且也欣赏和热爱中国人。”至于他欣赏和热爱的程度, 埃尔温·维克特说: “他写了很多书, 大部分是关于他在中国的生活,

书中还配上了照片和别致的幽默画。他的书大多是纯个人的记录, 从未发表过, 虽然只是手稿, 却装订成册。对中国的艺术, 他谈不上精通, 可也略知一二。他在文学、音乐和科学研究领域没有专长, 但是念上几首感伤诗却能使他泪流满面”。^①

① [德] 约翰·拉贝: 《拉贝日记》, 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第712、707页。

这五卷的《我眼中的北京》，内容相当丰富，且各有特色。记录的时间为1908至1930年间。大部分内容记录的是北京的方方面面，也有极少部分是关于天津的。前两卷以民俗为主，后两卷以建筑为主。由当时被称为“洋鬼子”的老拉贝精心地把它们分类整理出来，并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和经历，有的段落鲜活、生动、感人，反映了一个外国人审视近代北京的视角和兴趣。他的这些100年前旧北京社会和风俗民情的记录，一些是我们有收藏的、但极少；有的则是难找的文献，也应该有一定的文物收藏价值。有些也可以补充我们文物收藏之不足，或起一些佐证的作用。应该说，这些内容对于研究北京的历史和民俗有很高的利用和参考价值。下面就具体对这五卷日记做简要介绍。

第一卷 市井生活

记录了北京街头巷尾和各种集市的风貌。从影壁的避邪功能讲到男人带绿帽子，从人力车夫讲到大车店和骆驼队，从娇惯孩子到路边小吃摊上各色人等的描写，等等，等等。其中最有价值的有这样几方面。

1. 关于北京人的婚葬和行刑。拉贝写了他自己目睹出殡和参加中式婚礼的情景。他认为“在北京，真正的视觉和听觉的享受要算是葬礼、婚礼和绞刑。”他不仅描写详细，还据此推断当时北京生活居住着约50至上百万人。其中，“拿到钱后很多人会立刻去买吃的，因为最底层的人永远处于饥饿中”的乞丐“在北京大约有3到4万”。

在书中他讲到了中国死刑的残忍和中国人对犯人死后是否有全尸的重视程度。他在书中附了一组照片，是1912年枪杀革命党人的照片，并附了这样的话“某些杀人抢劫犯在行刑前还要由警察押解着游街。直到行刑前囚犯都要大声斥骂法官和刽子手，这是英勇无畏的表现。革命期间，可以当场砍杀抢劫犯。”

2. 关于中国人对象棋的喜爱到了痴迷的程度。“在饭店的大厅里、在贫穷的看门人的房间里、在城墙边灰尘四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沉思的、知足的人在玩象棋。中国人对象棋的热情是巨大的。即使是街边的小乞丐，都会聚在胡同里，兴奋地用小石头充当棋子，在沙地上画棋盘，玩赢铜板的游戏”。

3. 关于捐画给汉堡博物馆。拉贝说：“照相机在全世界普及之前，北京有一大批人物肖像画家，他们不全都是伟大的艺术家，只是靠为别人画肖像为生的艺人，但偶尔他们也会有惊人之作。随着照相机的普及，他们很多人都失业了”。他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古玩店里收购了几百张水彩画人物画作，捐送给了汉堡人类学博物馆，很快就收到了“中国宫廷人物肖像集”的证书。拉贝把证书照片也附在其中。“尤其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品纯粹是中国人制作的，表现了他们自己眼中的中国人的形象”。这部分是画在羊毛宣纸上的彩色人头肖像和儿童全身图。有满人、蒙古人。上至王宫贵族，下至普通百姓、老人、妇女、儿童都有，人头画像栩栩如生，像是临摹作品。它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晚清至民国期间北京人的服饰和社会生活。

4. 关于隆福寺热闹的集市场面。拉贝对此有详细的介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游客日”的描写：“美国旅行团蜂拥到北京的日子，他们（指小贩）会把物价抬得出奇的高。美国游客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可思议的便宜’，他们在买东西时典型的问题就是：（在卖主说了价格之后）‘金币还是银币？’卖主听到他们这样幼稚的问题后，甚至在回答说‘当然是金币’时都会结巴，碰到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们也得努力地掩藏好内心的狂喜。”这段话不仅写了集市的风情，还告诉我们当时“市场里也有银行的身影——现金兑换。人们可以在这里用银币换铜板，当然银行会从中捞取一定的利润。”在其他的日记中还有东安菜市场等彩色照片，上面明显的有英文的门额，反映民国时期英文的普及程度和贸易的开放程度。

5. 关于北京的交通工具。在本中有描述，说明当时北京还是以人力车为主，逊于上海（那里已经使用摩托车送葬）。但是也有这样的生动描写：“优越一些的‘西方人’拥有自己的私人人力车，这些更壮实的人力车夫觉得有义务比职业人力车夫跑得更快，自己觉得高人一等。时不时地在街上也会上演人力车赛跑大战，车夫们疯狂地赛跑，根本无视客人的警告，直到他们累得精疲力竭。”

第二卷 北京民俗

这是画面最漂亮、内容最丰富的一卷。据说自18世纪末，为了满足来华

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在北京等地就有了专门为外国人画中国风情画的行业。这些人的作品，虽不是印刷品，却也不是单一品种。“百工图”就属于比较流行的一类。从这些画的内容看，有的已经是民国年间的作品了。一方面说明这种行业存在的时间之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拉贝本人的收集兴趣之大。有的看样子是他专门请人画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拉贝不仅对自己这些收藏做了系统的分类，而且用现实的照片和手工图画相对照的形式编排。一般情况下是：一两幅实景照片，对应一幅彩色画图，并配详细的文字，表述自己的感受。这卷的看点有以下这些：

1. 前门的商业繁荣、各具特色的幌子和戏楼。作为一个商人，拉贝对被洋人称为“前门卫”（大栅栏）的观察视角独特。在他的眼中，前门地区是胡同最窄但生意却是最红火的地方。在那些胡同里有许许多多的牌楼和拱门，各行各业的店铺门帘和招揽生意的幌子在风中飘舞着，还有摩肩接踵的人群。但是奇怪的是，如此拥挤的人群却很少发生争执。众多的黄包车和汽车也是缓慢的爬行，却未曾发生恶性交通事故。在这里汇集了丝绸和皮货店、金银饰品店、书画店、各种可以想象出来的中国的生活用品和奢侈品店，特别是让西方人兴奋不已的古玩店。前门卫附近也有娱乐休闲的地方，除了杂技、走钢丝、踩高跷的表演，还能看到各种传统剧院。至于各种手工绘制的漂亮的幌子，书中记载的有103幅之多。有小店幌子、码头幌子、万顺席店的幌子；有香油铺的、音乐铺的、粗粮铺的、筒饭铺的、鞋店的、棉花店的、绒线铺的等等的幌子。如果这些幌子的风貌保留至今，我想是绝对毫不逊色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城挂满各具风格幌子的“粮食胡同”。

关于前门的热闹还有其精彩的描写之处，就是关于戏楼的描写。拉贝认为“中国戏剧是一种外国人无福欣赏的艺术”。因为对翻译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因此，不能达到完全跟上剧情的效果。更有意思的是对场子里听戏中国人的描述，实在令人捧腹大笑：“让我和其他一些欧洲人感到不舒服的还有中国人听戏的方式。中国人听戏是全家老小一起出动，他们会带上孩子和随从，又吃又喝，并且和邻座的人大声交谈，吵闹而且粗野。让我感觉不像在听戏，反而像在饭店。孩子们尖声吵闹，母亲给孩子喂奶，地上都是瓜子皮，还有孩子在痰盂里解手，

中国人对这些却毫不在意。此外，空中还时不时地飞过几条擦脸擦手的热毛巾。要知道，来听戏的外国人必须全神贯注地跟随演员头、手、胳膊、脚的每个动作，并认真地听翻译解释这代表什么，才能理解台上到底在演什么。”

2. 各种民间生活的写照。也就是百工图丰富的内容。有磨剪子磨刀的，拉车的，卖苦力的，钉马掌的，修笼屉的，箍盆的，剃头的，锯木头的，修鞋的，收拾雨伞旱伞的，织网的，贴扇子面的，捡烂纸的；卖沙锅的，卖豆腐脑的，卖火烧的，卖小油灯的，卖西瓜的，卖水的，卖旧衣服的，卖小零碎的，卖膏药的，卖冰的，卖丰糕的，卖小金鱼的；遛鸟的、舍粥的等等。在他介绍的行行业业当中，有稳定和不稳定之分。不稳定的人中主要有对乞丐之类的描述。就像今天一样，这是一群今天给了好处明天又来乞讨的那种职业乞丐。至于僧人乞讨与一般乞丐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默默地走路，转动手里的花环或手鼓，只用眼神和手里的饭碗乞讨。”稳定的人主要是指上面描述的各色人等，也介绍得很仔细。如剃头师傅用Y字型的音叉叫卖。木匠是怎样的“木直中绳”。“磨剪子和磨刀工用喇叭宣布自己的到来。喇叭是一件很难演奏的古老乐器，磨刀工把喇叭挂在凳子的左边”。修补价值连城花瓶和盘子的铜碗手艺在欧洲也是存在的。更有意思的是“在北京的天坛附近有一个所谓的‘小偷市场’。如果家里丢了什么东西，早晨开市可以到这里来转转。一些特定的东西，比如说福特汽车的冷却盖，在这里只需花1美元，甚至更便宜就可以买到，但在商店里却要4美元”。对于“惜字会馆雇人取回字纸焚之图”的介绍让人开眼。拉贝还特意形容“在叫卖时，卖豆腐脑的人要捂住左耳朵。很多叫卖的商贩听觉都有障碍，或听力不好，这全都是职业病”。

3. 套画系列。除了前面提到的幌子系列、百工图系列外，还有各种手绘的扇面系列、儿童游戏图系列等以下几种。

(1) 手工绘制的各种妇女头型图。有姑娘蝴蝶头、姑娘双髻髻头、乡间高冠头、喜鹊尾头、妇女圆头、妇女苏州头、满洲妇女两把头（正面和背面）、直隶武清县头、满洲妇女高把头。这些头型图漂亮之极，是很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资料。

(2) 古代衙门收审犯人的情况。包括草熏刑、打火板子、脚枷、站木囚笼的、

两人架着赴刑场的、狱卒看犯人睡觉的等。“绞刑被认为是温和的死刑方式（因为能给犯人留下全尸）。如果我没记错，1923年有一群政治犯（男女共产党）就是被绞死的，整个过程持续约10分钟。我希望以一句一个衙门口上贴的警示语结束这章：远离公堂！”

4. 社会风俗的介绍。拉贝特别提到满汉妇女的不同之处。其一是两张寓意鲜明的图片，使人们了解游牧民族的满族妇女保持天足和汉族妇女缠足的习俗渊源以及晚清民国初她们的社会地位的尊贵差异。关于汉字的难学、用筷子吃饭的技巧、汉字的寓意深刻、全民饮料“茶”的重要性，中国人的慈善观都有具体的见地和介绍。

通过这卷可以了解到当时北京的现代化程度还是很落后的，如人工制冰是美国使馆的卫兵引入中国的，但可惜没有流传开来”。中国家庭用的剪子和刀基本都是白铁铸的，白铁是很久以前从比利时大批量进口的，由“旧马蹄铁”组成。做惯了沙发的欧洲人坐在北京戏园子的长木凳上要不了几分钟就开始难受，“而中国人可以坐在上面数小时，而似乎根本感觉不到不舒服。”

第三卷 典型建筑

拉贝在卷首对北京城的历史沿革和各个城区的划分作了详细的介绍，并附有大量的城门和城墙图片。有些城门至今仍有保存，多数城门随着城市化进程已不复存在。有的图片的解释给我们的翻译也带来了费解。比如前门火车站的水门。对于中国的建筑风格，他的解释是：“不论是宫殿还是庙宇，从建筑学上讲，中国的住宅都是由从前的游牧民族居住的帐篷演化来的。层层飞檐、雄伟的建造风格以及巨大的庭院都给来访者一种压迫感，让人觉得主人的权利是无限的。穿过巨大的庭院，逐渐接近皇权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与卑微。”

在这卷中，特别介绍的有紫禁城、景山、雍和宫、天坛、南海、国子监、古观象台、钟鼓楼、国子监、城墙、中央公园等重要的国家级建筑。说是介绍典型建筑，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权力的介绍。比如，当时景山不是人们随便可以去游玩的。外国人需要有许可证才可以登山。“乾清宫是皇帝听取觐见的地方。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外国势力要求皇帝在这里接见他们的使

节。也是在这里，可怜的光绪皇帝曾听取康有为的变法主张。1908年11月到1909年2月光绪的遗体也存放在这个大殿里。”

郊游公主坟的图片和记录引起我们的注意。据拉贝记载，他们夫妇和两对朋友到城东的公主坟郊游，并拍摄了一些照片。但是根据拉贝的描述，这个地方不是今天的公主坟，至于到底在哪里还需要进一步搞清它的地理位置。

关于中央公园和克林德碑。众所周知，克林德是德国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驻华公使。义和团运动中被清军神机营兵丁毙于东单牌楼。而后在清政府被迫与英、美、德、法、俄等11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列强强迫规定，清政府派醇亲王载沣（1883—1951）为头等专使大臣，代表中国政府就克林德被杀一事亲赴德国谢罪致歉，并在克林德被害处建立牌坊，为侵略者“涤垢雪侮”，并在上面刻着“为国捐躯，令名美誉”等字样，这是中国的奇耻大辱。1918年11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于是1918年11月13日，北京城兴奋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碑，由东单迁移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都记忆犹新。对此拉贝有自己的感触，“从北京的哈德门到西门子办公室要经过克林德碑，在汉堡我们叫它石门。克林德碑用三种文字标识着，德文、拉丁文和中文。前两种语言几乎没有人懂，能读中文的人也不多。如果你问一个若有所思地观看克林德碑的中国人：“老人家，这个碑上写的是什么字？为什么要树立这座碑？”他很可能会回答“这个碑是为了纪念杀害了克林德男爵的人而修建的。”“在中国人民鼻子跟前建一座象征他们屈辱的赎罪纪念碑，这样的做法是否正确尚待讨论，但惩罚是要有的。”可见，即使在抗战中为营救中国难民奔走呼号的拉贝在对这个殖民侵略官的态度上也摆脱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

第四卷 名胜古迹

在这一卷中，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北京的各种庙宇、佛龛、寺庙和园林。今天鲜为人知的图片有蔚翠牌楼、玉泉山、东岳庙、碧云寺和胡汉民衣冠冢等。其中他把圆明园写成老夏宫，把颐和园写成新夏宫。

本卷中讲到了圆明园的建筑设计思想和郎世宁的设计风格。讲到了1860

年英法联军在额尔金伯爵指挥下火烧圆明园的情况，“经过两天两夜，这座宫殿被完全烧毁，但是直到今天人们还能从大理石废墟中推测出这座建筑曾经的雄伟和华丽。”至于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的问题，书中也有详细的描写。

书中还有拉贝夫妇和朋友到戒台寺游玩的图片和记载。他说对于戒台寺“我们德国人尤其感到亲切，因为一部分德国军队（公使馆的警卫）曾在这里过暑假。”并且说当他们到达戒台寺时“德国军队方面和僧侣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为了提高兴致还喝了德国啤酒，直到即将来临的拂晓……”。“在度过了美好的几天休息日之后，我们在早上四点钟就登上山顶告别，并高高地在云层上经历了一次绝美的日出，就像大自然的一次宗教典礼，美得无以复加。”可见北京的风景的确令外国人痴迷。

第五卷 《慈禧的最后诏书》（清末民初的北京）

在这五卷日记中，这一卷的分量最重。严格意义上讲，这不属于《我眼中的北京》系列，但是它又是前面讲到的四卷日记的引子。因为在这卷里，拉贝介绍了自己创作四卷《我眼中的北京》的意图，并且附有一定数量的晚清文件。

1. 写作《我眼中的北京》的目的。在卷首的扉页，拉贝有详细的写作说明：“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或踏入一个陌生的国度，我们应该把最初的感受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否则日后将成为一种遗憾。27年后的今天，我想弥补当时的缺憾。虽然某些东西已经遗忘，但留在记忆中的仍旧能够支撑我完成这部书。我亲爱的妻子保存的曾经的家书以及当年的笔记和印刷品是我回忆的参照物。1935年11月1日，南京”。在卷尾拉贝写道：“经过日后长时间的回忆、整理，又写了这么一个长长的前言，我终于可以进入到正文《我眼中的北京》”。由此说明，四卷《我眼中的北京》是请人专门制作的追记性作品，开头部分还详细地记录了拉贝从德国到中国北京一路的历程和见闻。

2. 部分家信。在这卷中抄录了1908年11月13日至20日间部分与家人的通信。这些信中谈及的问题都是关于光绪和慈禧母子病危时北京政局的每日瞬息万变的情况。主要是宫里的各种谣传对外面社会稳定的影响，各国驻京使